

中国文学史学史

主编 董乃斌 陈伯海 刘扬忠

(第二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学史

(第二卷)

主 编 董乃斌 陈伯海 刘扬忠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按时间原则划分的文学史类别	(1)
第二节 中国文学史的范式问题	(6)
第三节 断代文学史的成立	(11)
第一编 中国文学通史编	(19)
第一章 中国文学史的产生与定型	(19)
第一节 文学史：从确定文学范畴起步	(19)
第二节 入史标准的变化：从杂而泛到纯而精	(28)
第三节 高潮的酝酿：从二十世纪初叶到二十 年代末	(38)
第二章 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化之路	(50)
第一节 还原历史还是建构历史	(50)
第二节 开一代风气的胡适《白话文学史》	(53)
第三节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显示的方 向	(59)
第四节 中国文学史现代范型的确立：从冯沅君、陆 侃如到刘大杰、林庚	(71)
第三章 中国文学史与大学教育	(75)
第一节 中文系不变的主课	(75)

第二节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教程·····	(82)
第三节	关于文学史教学的批判与反思·····	(88)
第四章	历史的曲折与转机·····	(95)
第一节	“文革”中的文学史研究 ·····	(95)
第二节	难以摆脱的旧路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	(100)
第三节	文学史新浪潮及其展望·····	(103)
第二编	断代文学史编·····	(114)
第一章	古代文学的断代史著述·····	(114)
第一节	先秦至隋的文学史·····	(114)
第二节	唐宋文学史·····	(143)
第三节	元明清文学史·····	(173)
第二章	近代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	(191)
第一节	新文学家对晚清民初文学的历史总结·····	(193)
第二节	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史体系的建立·····	(209)
第三节	近代文学独立成史和编撰的多样化·····	(232)
第四节	近代(文学体系转型时代)文学史新体系的探索·····	(256)
第三章	现代文学史的形成与发展·····	(273)
第一节	“新文学”观念确立前后 ·····	(273)
第二节	从革命文学到作为制度的文学史·····	(277)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史研究·····	(281)
第四章	当代文学史的产生和发展·····	(296)
第一节	权威的阐释·····	(296)
第二节	浩劫后的“拨乱反正” ·····	(306)
第三节	“二十世纪文学”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史写作·····	(317)
第四节	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实绩·····	(333)

绪 论

第一节 按时间原则划分的文学史类别

本卷包括两编：中国文学通史编和断代文学史编。文学通史和断代文学史是两种按时间原则区分的文学史类型。

所谓通史，是从远古、从有史以来一直“通”到当代的历史著作。以二十四史为例，其第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叙述范围，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作者生活的当时，即汉武帝时代。紧接着它的班固的《汉书》，因只记西汉一代之事，便是断代史了。当然，后来的通史对所“通”的时间长度并无一定之规，只要不是单记一代而是通述几代史事的，也都属于通史，如唐人李延寿所著的《南史》、《北史》，前者述南朝宋齐梁陈之史，后者述北朝魏齐周直到统一中国的隋朝之史，成为纪传体正史中《史记》以外的两部通史，其余则都是按王朝分撰的断代史。一部一部断代史没有间断地连接起来，也就成了通史。这是中国纪传体古史的情况。至于《资治通鉴》，则是编年体的通史。二十世纪以来，受外国学术的影响，历史著

作多采用章节体，于是出现了章节体的通史。

文学史的情况与此相似。从时间概念而言，既然号称通史，自应从文学产生以来叙起，一直延伸到当代才是。可是，实际的情形是，即使未能贯通古今，而只从上古叙述到晚清，一般也就称为文学通史了。这是因为中国历史太悠久，文学史也太悠久，从上古到清末，也已有数千年，能叙述这么长久的文学历史，不愧为“通”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史学家们认为，从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起，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剧变。这一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路，清王朝虽然还统治着中国，可是中国的“古代”已然告终，“近代”的序幕已经拉开^①。所以，不妨以 1840 年为断，把这以后的文学史称作“近代文学史”，而将从上古写到这之前的文学史承认为通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之间画上了等号。后来曾有一些文学史家想真正打通古今，把文学史从古代一直写到当代，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未产生一部成功之作。直到 1997 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合所内外的力量，完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中华文学通史》——从地域和民族的角度，它基本上涵盖了整个中国；而从时间跨度而言，则从上古通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这还是一种尝试，一个初步的成果，距它的成熟还有漫长的途程。

以 1840 年为界划分中国文学史的段落，反映了按社会性质划分历史阶段的思路。这个思路严重地影响着此后的文学史研究。

1840 年之前，笼统说来是前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可是

^① 据云：史学界最早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的，是李鼎声（平心）1933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请参阅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 11 页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840年之后，社会性质的变动就迅速了，史学界的研究明显地制约着文学史界，于是文学史的段落分割就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较早时候，人们在探索，在尝试。胡适于1922年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叙述1872~1922年间的文学演变，从眼下往前追溯半个世纪^①；陈炳堃（子展）1930年写《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②，所叙述的就是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的文学运动。周作人于1932年在辅仁大学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往上追溯到晚明的“公安竟陵”，中经“清代文学的反动”，然后才说到因社会剧变而导致的新文学运动^③。可是他们都还没有明确标出“近代”、“现代”、“当代”之类的概念。此后，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叙述时段是1917~1933年；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则推前从戊戌政变说起，直叙至左翼作家联盟的产生；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企图总结五四以来各体文学的变化，叙述的下限是“五卅”惨案后的数年间，也就是三十年代初^④。看得出不同的研究者寻找着现代文学起始点的努力。到周扬于1939~1940年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开讲“新文学运动史”课程时^⑤，这个起始点就基本上算找到了，那就是发生了五四运动的1919年。因为根据毛泽东的论断：“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

① 本文原载1923年2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又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

② 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③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

④ 王哲甫书，杰成印书局，1933。王丰园书，新新学社，1935。吴文祺书，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

⑤ 周扬的讲课提纲，后于1986年第1、2期《文学评论》连载发表。

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①而更具体的说法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所指出的：“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②政治上的时期划分，决定了文学史的断代。从此以后，1919年就不但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发端，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始点。而从1919年倒推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八十年就是夹在古代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时期，这一段的文学史，就有了“近代文学史”的名目，偶尔也有把这一段与古代文学史相接，或与现代文学史相接的做法。随着革命的进展，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划时代的大事。在这之后，革命性质变为社会主义的了，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与延安和解放区文学，与旧中国国统区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作家来看，也是同一批人，但建国以后的文学却再不能与此前的文学同日而语了，它们是崭新的当代文学，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当代文学也就成了“史”，而且用不了多久，它的长度就超过了现代文学史。

我国文学史体系的一个重要格局大致就是这样形成的。以时间的切割为原则，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习惯上四大段。这显然很不平衡，古代超过三千年，所以在古代内部又形成许多断代史，大多以王朝起讫为断，其中的问题下面另说。而近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60页，人民出版社，1966。

^② 毛泽东《五四运动》，同上书，第545页。

代八十年，现代三十年，都已上下封住，难有变化，亦有明眼人发现，所谓近、现代这一百年恰当二十世纪，而且其间确有许多相贯相联不可分割之处，所以应该把它们连起来，称作“二十世纪文学史”，这是一种新的学术构想，是可以持续发展的。从1949年起始的当代文学史至今已满五十年，还将继续延伸下去，大有发展前途。

这样的分段是否科学合理，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但现有文学史著的客观事实和状态就是如此。这就是文学史按时间原则切割所产生的类型，也是文学史的基本类型——说起来，文学史的类型，有着很多种，但从这百年来的文学史实践看，最基本或最多最发达的是两种，一种是按时间原则分类，那就是通史或断代史；一种是按文体原则分类，那就是各种文体史。这两个原则的交叉，又可以产生一批新形式的文学史，但总有所侧重，大体仍可归入其中的一类。至于按照别的原则，如按地域、族别、流派、题材或主题、作者身份，甚至按接受对象等等都可以构建出文学史来，不过一百年来后边那些文学史类型远不如上述两种发展得充分。鉴于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设计《中国文学史学史》全书构架时，就把按时间原则和按文体原则形成的文学史作为两个大类，让它们各占一卷，其他种种类型则依其著作的多少，或列章或列节，附于文体卷之后。

这样，文学通史和断代文学史就合成了一卷。在这一卷中，再将时间跨度长、著作量大，在大学教育中作为基础课程的通史列为一编，而将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史与切割古代文学而成的断代史合成另一编，庶几能够使眉目清晰一些。

第二节 中国文学史的范式问题

通史是文学史世界的泱泱大国。

它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上出现得最早，林传甲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分别于1904年和1905年问世。断代和分体两种类型的文学史要比它晚些，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既断代又分体，是不同于通史的一大创造，初版于1915年；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可算是最早的断代文学史，初版于1920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分体文学史下的一个小类，其油印讲义出版之年也是1920年。而到此时，继林、黄二氏所出的通史性的中国文学史，已相当多了。

文学通史与大学教育联系也最早最紧密，林、黄之著本来就是为大学课程而撰写。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史成为大学中文系不变的主课，不管时势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大学还办中文系，就不能没有中国文学史这门基础课程——当然，它需要、也一定会随时改进。文学史课程（有的配合或融合“作品选”课程）按时代为序介绍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一切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资料，给学生多方面的基本知识，既给他们提出或留下许多需要追索的问题，也为他们今后的深造奠定了基础。师资力量强大的学校，还会以文学史为主干和线索，生发出一系列的专题课，为学生做出进一步精研的范本。可以说，以文学史为核心的一系列课程，对于把学生引进文学研究的大门，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有着非常具体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许多时候，这门课程还走出中文系，以不同的名目和繁简程度进入别的系科，成为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重要环节。

以描述中华民族的文学财富、阐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文学通史写作，既是学术研究和著述的一种思路和途径，

又是普及知识和学术、提高国民文化水准和民族自信心的有力手段。一部优秀的文学通史，就是一部用历代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构成的国史，它的精神价值、教育意义和感染力都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在二十世纪百年的风风雨雨中，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一直受到重视，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安身立命之地。而在总数上千种的文学史中，也以通史所占的比重为大，以致一般人提起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往往就是指文学通史^①。

中国文学史的百年途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中国文学的历史如此悠久，遗产如此丰富多彩，如何用一部史书来反映这些，既要充分，又要科学；既要在观念上、理论上与世界学术接轨，又要切合中国文学的实际，不丧失自身的特色；既要描述史实，又要探讨规律；这实在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难题。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学史的百年历程，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从观念到形式、从结构到话语，都由传统走向现代、从混沌走向科学的艰辛之旅，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也有巨大的进展，百年的实践已为今后的文学史研究和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化之路，包含着形形色色的转变和演化，这变化有一个总的方向，显示着前进的趋势，但也不是没有逆转、倒退和反复，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紊乱的状态。具体地说，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首先有一个从摹仿到独立、从沿袭到创造的过

^① 各类文学史著作，总数几何，并无确切统计。已有的几本文学史书目，统计的方法不一，截止的年代不同，故都不精确。但以最晚出的一种（黄文吉编撰《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所说，自1880～1994年，台湾、大陆、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欧洲、美国、苏联等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共计1606种，其中古代文学史中的通史类，即占425种。此外，尚有一些以“概论”命名的著作，如刘麟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八论》（世界书局，1936），其中每一“论”均有史的叙述。又如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虽称概论，也含史述。

程。文学史的思想 and 实践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早就存在，但现代的、章节体的文学史著作形式却是从外国传来的，是欧洲人最早写出了文学史，也是欧洲人最早尝试了中国文学史，接着是日本人，然后才是我们自己^①。早期的文学史家并没有隐讳这一点，我们也不需要回避。他们在摹仿外国人的时候，同时又不能不从自己先人那里汲取营养，把史书中的文苑传、经籍志、艺文志、书目题解和诗文评之类作为编写文学史的重要资料，而较少自己见解的发挥，更没有创造出一套富于现代气息的文学史话语。但到三四十年代，文学史家们的编写技术就圆熟得多了；五六十年代虽经曲折，还是有了更大的长进，中国文学史终于有了自己的写法，自己的专业话语；而到了八九十年代，更呈现出一片多元化的态势，在前人摸索的经验教训之上，年轻的一辈更善于也更容易于发挥个人的独创性了。

决定文学史范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文学观，文学观的核心是对文学特殊性的认识和对文学内涵、外延的界定。百年来中国文学史家们文学观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正反合”过程，相应的，文学史范式也有了三次重大转变：先是传统式的宽泛庞杂，使文学和学术相混；渐进为现代西方纯文学观的狭窄精密，强调形象与情感，而排斥应用、游戏和“载道”，只承认诗歌、散文（其中的一部分）、小说、戏剧是文学文体，以至在某些方面缩小了中国文学的范围；然而，经过这番新文艺理论的洗礼，加上对传统文学观和数十年文学史实践的反思，尔后又达到了一种新的

^① 据马汉茂（H. Martin）《欧美文中国文学史介绍》（载台北《书和人》，1968年第79期），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德国人 W. Schott 于 1854 年（清咸丰四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草稿》，以下是 1867 年出版的 A. Wylie《中国文学注解》（英文）、1880 年出版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俄文）。此后才是日本人古城贞吉（1897）、笹川种郎（1898）等人的《支那文学史》，而英国人翟里斯（H. 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初版于 1901 年。

大文学观，主张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采取尊重史实，尊重当时人观念的态度，而不再硬性地拿中国文学之足去适应西方纯文学观念之履。与此有关的，则是文学评价标准的演变，文学发展动力的探讨，文学史规律的描述，等等，也都决定着文学史的面貌和质量。我们在这里说得如此简略，可体现于百年来的文学史著，其实是非常复杂多样的。

关于文学史观，百年来的变化也是甚多甚大，而且其中也是充满差异和反复。退化论让位给进化论，进化论又让位给阶级论，阶级论一度统一天下，但终被“不同阶级可以有共同的审美”的事实打破。文学发展的原因、动力究竟在其内部，还是在其外部？文学史的主体究竟是代表高层次文化的知识精英，还是代表一般或底层文化的民间大众？它们之间以及文学创作中各种不同艺术倾向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是所谓两条路线的对抗和斗争，还是共存、互补、相融？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回避不了的，百年来也是争辩不休，反反复复，总的趋势则是每争一次总有所深入，虽然迄今尚无定论，其实也无需定论。然而，透过种种不同观点，人们却不难发现，中国的文学史家一般都更重视外部因素主要是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制约和影响。“知人论世”、“与时推移”、政治经济状况决定文学面貌、统治者提倡与否影响文学盛衰等等观念往往成为解释文学史现象的基本理念。进一步，则物质生产手段、印刷出版条件、稿酬制度与作品传播状况等等，对于文学的影响，也较多进入了研究视线。简言之，便是多善于从“他律论”的文学史观去阐释文学的发展变化，而从文学内部、文本自身（语言、修辞、音韵、格律以及一切属于文学形式的问题）去探索它的发展动力，做得还很不够，既没有充分利用古人的丰富遗产，也没有认真考

察国外学者的成败经验^①。只是到了近几年，文学史观的转型和多元化才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单一的“他律论”研究思路开始发生变化。虽然转变刚刚开始，但已有了喜人的成果。可以预见的是，文学史观念真正地多元起来，每一种独特的文学史观真正地成熟起来，必将使文学史范式呈多元化态势，从而带来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巨大繁荣。

在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上，中国文学史家们还经历了另一个有趣的“正反合”。最早的文学史大抵是个人完成的，至多有一二位合作者。那时的文学史说的是作者自己的话，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和人格的某些方面。到了五六十年代，一系列过火的文化批判运动使个人写作文学史被视为畏途，先是知识准备不足的学生们靠集体力量快速地生产出新编的文学史，这个尝试不成功，接着便由教育部或研究所组织专家们集体重写文学史，效果自然好得多。从此，集体编史，特别是编写具有一定规模的通史，就成了一种常规、一种模式。这样完成的著作因为集中了众人的智慧，自有其优点；可是，也因为观念、水平的差异而不易平衡，而反复地打磨找齐，往往使它缺少锋芒和棱角，更不必说个人的风采。一个时期以后，老专家们纷纷老去，新培养起来的学者由于知识结构的缺陷和知识积累的有限，多数失去了独力撰著文学通史的能力，偏偏文学通史自身的发展又有日益深细广博的要求，个人写作通史变得更加困难，要搞这样的大型著作，就

^① 参见吴龙辉《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断代总结——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载《书品》2000年第5期。其文谈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聚集了刘盼遂、谭丕谟、李长之、王汝弼、启功等一批著名学者，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有影响的学派。其鲜明特色主要表现为注重文献考证和历史文化背景分析，旨在透过文献背景考察文学诸因素的历史变迁，对文学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美学方法和文本分析则不予重视。”这里的概括是否准确可以斟酌，而且这种情况也并不仅存在于某一个学校，但是作者的这一发现是有启发性的，可与我们的看法相印证。

惟有集体分工合作一途了。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袁行霈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以至于本书的编著，都还是沿用了集体著述的方式。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走上了个人著述文学史之路，他们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专题来撰写文学史，既充分发挥了他们在某一方面的专长，又拓宽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道路，大大丰富了文学史的品种。我们虽是一个文学大国，虽然有那么多大专院校，但集体编著的文学史却实在不必太多，而各式各样反映个人研究所得的文学专史，却应该是多多益善。如果在一段时期内，文学史的个人化写作代替了集体编著方式成为学术主流，显然并非坏事。

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化之路漫长而又曲折，这可以说是我们这部书的主题。在这一编，我们将围绕着文学通史和断代史的种种问题对此做出阐述。而将按文体原则区分的一大批文学史，放在下一编来说。为了节省文字，也为了避免与已出版的文学史书目提要类著作相重，我们采取从史实中提炼问题、夹叙夹议的方式来展开史的论述，而不是按出版先后逐本平铺直叙地介绍文学史著。史实清楚而又富于思辨，每一个执笔者在遵循全书大纲的前提下充分自主发挥，不求刻板的统一，以求不但告诉读者以知识，还能引发他们的思考，这是我们的学术追求；而由这种撰史方式带来的缺陷，则希望通过书后所附的参考文献和征引目录聊作弥补。

第三节 断代文学史的成立

本卷的断代史编将近代、现代、当代作为论述对象，这很好理解。但对古代文学史则必须再做分解，因为中国漫长的古代文

学史，可用不同方式分为好多断代。这里所论的断代文学史，是指与通史性质一致的综合性文学史，即它们所述所论不限于某一种文体而涉及各种文学体裁、各类作家，它们与通史的区别，最显眼而又根本的，是在于叙述的时间范围上一个“通”一个“断”而已。像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鲁迅的《汉文学史纲》，就是两部产生年代较早的著名断代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自然是有区别的，要不然它便没有单独存在的理由，这一点下面还将谈到；可是，另一方面，断代文学史毕竟是从文学通史的整体上割截下来的，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反过来，将断代文学史相连缀，也就可以成为一部文学通史。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没有完成，已写出的部分讲义就成了断代文学史；新时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原曾取名为《中国大文学史》），实际上也就是十部断代文学史的汇集。

我们现在所见的断代文学史多是以朝代，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来划分的^①。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虽以“中古”为名，而其实际包含的，还是魏晋南北朝一段，只是向上追溯到汉末，大致从汉魏之际讲起而已。文学的发展演变，犹如一条滔滔长河，照理是不应切割的，而且文学的演化并不与朝代的变迁同步，南朝陈虽灭亡了，但陈代甚至更早的齐梁绮靡诗风仍然存在，经短祚的杨隋一直延伸到李唐初年。那么，通常所见的按王朝更替把它分为几段，成为断代文学史，这是合理的吗？可取的吗？这就关乎断代文学史存在的合法性和必

^① 先秦不是一个朝代，大抵从中国文学之起源叙起而止于秦统一者，均可称为先秦。

要性问题，并与文学史界曾反复讨论过的文学史分期问题有关了^①。

对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有所论述，他的观点见于《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②。该文针对当时有人“力非文学史之区划时期”，说道：“夫文学史之时期，自不能界域分明，有同匡格；然而作者之宗风习尚，相革相承，潜移默化，固可标举其大者著者而区别之。”这是一种很通达的观点，要旨在于：文学史之分期当然不是绝对的死板的，但就“作者之宗风习尚”的沿革演变来看，分期不但可能而且必要。文学史分期与王朝递嬗不必是一回事，它应以文学风貌演变的较大较著者为据，如唐诗可分为初盛中晚来论，“此乃诗中之初盛中晚，与政事上之初盛中晚，各不相关。尽可身生于盛唐之时，而诗畅初唐之体”，正如身为宋人明人乃至今人，也不妨诗有唐风一般^③。以上说明了分期虽不必“界域分明，有同匡格”，但从文学风尚的递嬗试为分期，还是可行的，分期自需建筑在研究的基础上，其本身也就是一种研究的成果。当然这里也就包含了分期可有多种方法、可以见仁见智之意，所谓按王朝更迭分期，只是众法中之一法而已。那么，对于大体依王朝更迭为文学史的做法又该如何看呢？钱先生继续写道：

且断代为文学史，亦自有说。吾国易代之际，均事兵战，丧乱弘多，朝野颠覆，茫茫浩劫，玉石昆冈，惘惘生

① 请参陈美林、万建清《略述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几种意见》，载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7。并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之《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② 该文原载《国风》半月刊第三卷第八期，1933年10月16日。收入《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③ 请参钱钟书《谈艺录》。